

10万人搬离乌蒙深山 3万人告别“泥石流乡”

云南易地扶贫搬迁收官之际见闻

乌蒙磅礴，战志坚。

鲁甸印家湾、靖安新区、会泽搬迁安置点……一座座新城正拔地而起，超10万贫困户逐步搬出大山。

时值云南易地扶贫搬迁收官之际，乌蒙山区“挪穷窝”、稳就业、“融新城”，越来越多贫困户开启城镇新生活。

告别大山“挪穷窝”

“连洋芋都卖不出去。”48岁的展文华回忆起早些年生活依然感到苦涩。搬出大山，是全家人的共同梦想。

展文华老家在巧家县发拉村，村子位于乌蒙山深处，海拔超过2800米。背靠大山，一家人挤在破旧的土木房里，她和丈夫靠着外出务工和种洋芋、苞谷养家糊口。

脱贫攻坚让梦想照进现实。2017年村里发生滑坡，展文华家被认定为易地扶贫搬迁户。2019年12月，一家人背上行李，来到100多公里外的鲁甸印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，住进150平方米的电梯房。

印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3700亩，正逐步成为巧家、永善、盐津等5县搬迁群众的新家园。

“以前我上学要走好几个小时的路，现在弟弟走几分钟就能到学校。”展文华24岁的儿子李富城在宽敞的客厅里笑着说，自己从不想过，家里有一天能用上无线网络，还有电视和饮水机。

目前，云南省鲁甸印家湾、昭通靖安新区、会泽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安置点的搬迁工作正加紧收官，已分别实现3.2万名、3.1万名和5万名贫困户搬迁入住。

春日煦暖，万象更新。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正搬出大山“挪穷窝”。

就近就业“稳得住”

“有活干，才能住得久。”鲁甸印家湾设置公益性岗位，如今展文华和丈夫成了社区保洁员。他们每天忙着上班，打扫社区角角落落，有一份

稳定收入，比在老家种地好。

稳住就业才能稳住群众的心。

为了让搬迁群众“稳得住”，印家湾积极建设苹果、蔬菜基地和高原特色食品加工园，还在6万平方米的厂房里引入箱包制作、电子配件加工、藤编等扶贫车间，帮助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。

同样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，曲靖市会泽县钟屏街道木城社区内12个扶贫车间，搬迁群众能在核桃加工、手工编织、分拣草莓等不同车间就业。

木城社区党委书记李翔介绍说，社区里开设扶贫车间，能有效消化劳动力，形成社区“就业圈”。

随着搬迁群众陆续入住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根据市场需求和劳动力实际需要，开展定向式、定岗式技能培训，内容涵盖家政、保洁、汽修等方面，帮助群众提升技能促就业。

“去年我们做了两个半月的集体培训。”李翔说，培训设在能容纳100多人的社区会议室，每晚请专业老师开展专项培训，“大家积极性很高，座位常常不够坐，不少人都站在过道听课。”

入户帮扶“融新城”

促增收的同时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以入户为“法宝”，开展志愿服务和文化活动，帮助搬迁群众“快融入”，谱写好易地扶贫搬迁“后半篇文章”。

“每户的基本信息收集有64项。”每天入户是木城社区第一书记韩戎的习惯，有时在一户人家，她一待就是一个小时，“大家刚搬出来，我们要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与心理变化。”韩戎说。

定期周末设点，不定期随时入户，木城社区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，定期开展义诊、法律咨询等公益活动。同时组建志愿服务队，开展带搬迁群众“进一次超市”“坐一次公交”“去一次医院”等活动，帮助他们适应城镇生活。

为丰富搬迁群众业余生活，木城社区还请来民间艺术团开展文化活动，组建山歌、广场舞、书法等兴趣团队。

韩戎还记得刚开始刚开广场舞的情景：“起

初大家只看热闹，都不跳，我们就拉着他们一起跳。”如今，广场舞队已有40多人。

夜幕降临，木城社区的小广场上渐渐热闹。不少群众跳起舞蹈，或领着孩子遛弯，或坐在花坛边闲谈，处处流露城镇化生活的新气息。

(记者林碧峰、彭韵佳)新华社昆明电

收到网上预订的生日蛋糕，贫困户袁双有把老母亲搀扶到客厅，点亮蜡烛后，唱起了生日快乐歌。

从山上透风漏雨的土坯房，搬到城里结实宽敞的楼房，还能这样给母亲过生日，年过半百的老袁以前想都不敢想。

袁双有的家原本在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舍块乡新山村。2018年底，因为自然环境恶劣，地质灾害隐患突出，舍块乡2000余户贫困户一起从大山搬进东川城里，袁双有家便是其中之一。

“全乡几乎都搬出来了。”舍块乡副乡长林鼎贵说，舍块乡是东川最偏远的乡镇，距离东川城区140多公里，交通不便，因为长年持续开采铜矿，全乡有50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，许多村民居住在采空塌陷区、滑坡隐患区。

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。东川是我国著名的产铜基地，当地采铜炼铜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。但随着矿产资源的枯竭，曾经十分繁荣的东川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贫困。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，导致当地泥石流灾害频发，甚至有“世界泥石流博物馆”之称。

作为昆明唯一的深度贫困县，东川区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7.3%，境内山高谷深、地势陡峻，贫困发生率曾高达52.88%。居住在偏远山区的贫困户只能靠天吃饭，种植玉米、土豆等农作物，每到雨季还要时刻提防泥石流从山上冲下来。

搬迁，成为东川许多贫困户脱贫的唯一出路。

“我们算过一笔账，这些贫困户如果留在原地，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的投入将远高于搬迁。”东川区委书记胡江辉说，在深入调研、反复研究

的基础上，东川区决定一次性实施易地扶贫搬迁8754户、32227人，搬迁户城镇化安置率达95.67%，这意味着要有3万多人从大山搬进城里。

2017年10月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建设后，数十栋高标准、高质量的楼房在东川城内拔地而起。到2019年春节，3万多名困难群众已分批全部搬进新家。

“刚搬到城里时，许多村民很不适应。”东川区移民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兴梅说，为此，东川区及时成立移民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，并在每一栋楼内成立党支部，由基层党员干部联系到户帮助村民适应城市新生活。

有的老人出门后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基层干部就为每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制作了一张联系卡，让他们随身携带；有的村民送孩子上学不方便，东川区教育局协调公交公司安排了12辆公交车，每天准时接送数百名搬迁户小学生……

“真是太方便了！”42岁的搬迁户刘顺昌说，搬到城里后，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，每天还有公交车接送，自己也能腾出更多时间打工。

搬出来不容易，但更重要的是稳得住、能发展。陈兴梅介绍，移民新区有劳动力1.3万多人，为了保障村民搬出来后能有稳定收入，移民新区管委会每周五都会举办一场小型招聘会，组织村民外出或就地务工。

“每家至少要有1个以上劳动力就业。”陈兴梅说，村民面试成功后，新区管委会还要提供全程跟踪服务。“如果村民去东川区外务工，我们要包车把他们送到厂里，把吃住都安排好，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。”

2019年，东川区实现脱贫摘帽，袁双有家也实现了脱贫，两个女儿毕业后都已工作，他每天除了照顾母亲，也可以在城里打点零工。“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。”他说。

(记者庞广)新华社昆明4月2日电

「天镇保姆」再出发

新华社太原4月2日电(记者武敬)“在家憋了两个月，现在又可以出门挣钱了！”正在收拾行李的康金花说，她已经和大同市一位雇主联系好做两个月家政，每月工资3500元。

康金花曾经是山西省天镇县三十里铺村的一位贫困妇女，全家收入全靠几亩薄田，光景好的话一年也就几千块钱。2015年，她参加当地组织的家政培训学习新技能，告别了黄土，走进首都北京做保姆。

“在北京一个月收入6000多元，比得上以前一年的收入。”这些年康金花依靠自己的双手彻底摆脱了贫困，迎来了新生活。

天镇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，属于燕山—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区。天镇县根据自身特点，探索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路子，打造出了走俏京津、享誉全国的“天镇保姆”劳务品牌，做到了“一人走出去，全家能致富”，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。

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，数千“天镇保姆”停下奔波脚步，被封闭在家无法复工返岗。

“根据家政服务人员滞留在家的情况，县里及时开设了线上家政技能培训课程，帮助她们提升职业素养。”天镇县阳光职业培训学校校长李春说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这也是“天镇保姆”们难得的“充电”机会。

遼家湾镇夏小堡村妇女温琳琳学到了不少家政新技能，做月子餐、婴儿抚触等等，目前她已经联系好太原的一份月嫂工作，“做月嫂虽然辛苦，但收入不少，每月可以挣1万元。”

天镇县扶贫办负责人表示，自2011年以来，借助邻近京、津、冀的地缘优势，天镇县已向北京、天津等地输出家政服务人员2.5万多人次，每年带回劳务收入2亿多元，依靠这支“天镇家政娘子军”盘活了全县脱贫攻坚大棋局。不久前，天镇县“脱贫摘帽”，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。

针对当前家政服务人员遇到的就业难题，天镇县相关部门积极联系疫情低风险地区的劳务公司，分期分批稳步推进，争取“天镇保姆”能够尽快就近就地就业。玉泉镇鲍家屯50岁的刘慧枝已经联系好去太原做家政服务，这些年，她坚持在北京做保姆赚钱，不仅供两个孩子念完大学，还在县城买下了楼房。

“过去想都不敢想能买楼房，那时就是白给你一套也住不起。现在眼界开阔了，在外面跑惯了，在家根本待不住，等过一阵子计划再去北京、天津。”刘慧枝说，天镇县不仅免费给她们做健康体检，还联系雇主用私家车接送，减少大家出门乘坐公共交通的风险。

李春表示，经过多方努力，现在已经有1000多名“天镇保姆”前往大同、太原等地做家政服务，顺利实现了就业，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，更多的“天镇保姆”将再次出发。

重逢故乡春

马守礼有十几年没见过故乡的春天了。

一头是务工工地天津市滨海新区，一头是故乡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镇中川村，每年春节，他匆匆往返相隔近1500公里的两地，只感叹时间太快、团聚太短。

年后村里疫情防控抓得严，天津是去不了了。“不能干坐着，家里还要生活。”马守礼寻思找点活干。杨家寺镇是高寒山区，平均海拔超过1700米。过去人们常种玉米、小麦，收成不好，很多土地都撂荒了，年轻人外出务工谋生计，村子越来越“老”。

“上面有老人，下面有两个娃娃，家门口也没啥打工的地方。我就去天津跑运输了，要装货卸货，干的是下力气的活儿。”马守礼说。

近五六年返乡，他看到村上渐渐有了变化。一座座钢架大棚拔地而起，还种上了稀罕的秋菜等蔬菜。有人不出去打工了，在村上的种植合作社找活干。马守礼家的10亩土地也流转出去了，每亩年流转费500元。

今年过年回来，他发现村上建了一个巨大的联栋智能温室。一问，竟然有2.4万平方米。

“要不去这儿试试？”大年初十，马守礼就在家门口的金土地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上岗了。51岁的他看上去强壮精神，平时给蔬菜浇水施肥，前两天修整了温室里的路面。“葡萄藤架也支起来了，杨家寺太冷，只能在大棚里种葡萄，技术会上门指导。”

何甲奇是金土地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。2013年，他偶然来到杨家寺镇，眼前是大片大片的撂荒地。“农民世代靠土地生活，撂荒太可惜。第二年，我就流转了176亩地试着种菜。”

在高寒山区种菜不易，何甲奇遇过波折、赔过钱。从大田种菜改为大棚种菜后，合作社开始快速发展。起初种白菜，后来种黄瓜、辣椒、秋菜，今年还尝试起花卉。如今，合作社共有大棚312座，联栋智能温室2个。

“产业发展起来了，也就有了更多岗位。今年雇人比往年翻了一番，有80人。年纪大的、不方便外出务工的都能有活干。在我们这儿年纪最大的有60多岁。”何甲奇说。

曾做灯饰生意的李欣也在杨家寺镇流转土地，第一次种起大棚樱桃。这几天，樱桃看上去还像翠绿的小枣儿，一簇一簇，繁盛极了。“大棚樱桃能早上市一个月，避开高峰，更有优势。”

李欣说，他们流转了200户的土地，其中贫困户30户。长期用工10来人，季节性用工四五十人。大棚里的活不重，老年人也能干。

目前，杨家寺镇近60%的耕地实现流转，共达2.4万亩，建成10个合作社和2个家庭农场，仅大棚就有近2000座。

种菜6年来，杨家寺镇年产量蔬菜达到7000余吨，产值约1500万元。蔬菜产业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，年发劳务费300万元以上，加快了全镇脱贫步伐。

原本是一个在空档期找活干的马守礼决定留下来。他说，现在一个月挣3000元，虽比在天津务工挣得少，但能照顾上家里，活也不重。“家里老人82岁了，还是在身边安心，以后就在家门口打工了。”

绿染柳梢，杨家寺的春天来了。(记者张玉洁)新华社兰州电

易地搬迁点
孩子们笑了

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拿银安置点，孩子们在幼儿园里玩耍(2019年11月15日摄)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，也是易地扶贫搬迁大省区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广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任务涉及约71万人。“十三五”以来，广西举全自治区之力，创新性开展工作，“挪穷窝”与“换穷业”并举，安居与乐业并重，将群众从“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”的地方迁出，以“一户一策”加大后续扶持，确保群众“搬得出、留得住、能致富”，有力夯实脱贫根基。截至2019年12月底，广西“十三五”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建设和入住任务提前完成，各项后续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。

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



帕米尔高原，羊倌搬迁下山变身“甜瓜王”

新华社乌鲁木齐电(记者曹志恒、马骥)在绝大多数人眼里，上山放羊和下山种瓜这两种营生似乎没有太大差别，然而，对于世代生活在新疆帕米尔高原上的柯尔克孜族牧民而言，这一转变，不仅帮助边境少数民族群众跨越了高原，还创造了新的历史。

两年前，斯提瓦力迪·司马义和苏来曼·司马义兄弟俩还是高原上的贫困牧民。在中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易地搬迁政策扶持下，两家人先后搬下山。

“弟弟2017年先搬下来，住进了安置小区，还分得一个扶贫温室大棚。”哥哥斯提瓦力迪说，“让我惊讶的是弟弟学会了种甜瓜和蔬菜，当年收入就有2万多元，第二年就顺利脱贫了。”

2019年春天，哥哥也下定决心搬迁。“谁不想过现代文明的美好生活？”斯提瓦力迪说，高原环境恶劣，医疗卫生条件差，前些年爸爸就因为突发心脏病，无法及时救治去世，“要是现在，完全有可能抢救回来。”

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

城郊的昆仑佳苑和丝路佳苑两个易地搬迁安置小区，安置了从帕米尔高原山区搬迁下来的1万多贫困人口。安置房通了水、电、暖，小区内还建有医院、幼儿园、活动中心等。“很多牧民做梦也没想到会过上这样的新生活。”

安置区的旁边，是一片现代化的设施农业基地。随搬迁牧民一起下山的阿克陶县哈尔隆乡干部玉素甫·托乎提别克说：“684户搬迁贫困户，每户都分到一个蔬菜大棚和免费种子、化肥，另外还有技术人员上门指导。”

易地搬迁之前，哥哥就曾在山上种过田，但山上种地和山下完全不同。山高谷深，只能在山坡上、河谷边找一小块地，种点玉米、豆子之类的作物，蔬菜、水果是想都别想。“有时候山里的雨下得急，山洪或者河水涨起来，一下就啥都没了。”

以前日子过得苦，很难吃到新鲜蔬菜和瓜果。“每次下山卖羊，在巴扎上吃碗拉面，菜里面有辣椒、西红柿、白菜等各种各样的菜，就觉得很好了。”

哥哥勤快能干，种大棚甜瓜也十分上心，他

努力地给弟弟和园区的农业科技人员学习种植技术。开春后，他家的大棚种下的甜瓜苗长到一人多高，有些已经挂果了。

眼下正是给甜瓜藤掐尖的阶段，好让养分全部集中在已经结成两个拳头大小的瓜蛋子上。斯提瓦力迪一刻也不想离开，累了就在简易床上躺一会儿。“大棚里的温度、湿度一变化，就要做相应的调整，要不然就会影响瓜的产量和品质。”他说，每一个甜瓜就像一只小羊羔，只有精心培育，才能茁壮成长。

因为种瓜技术好，弟弟苏来曼成了远近闻名的“甜瓜王”，乡亲们纷纷请他当技术指导。苏来曼告诉记者，兄弟俩种植的甜瓜是早熟品种，4月底就能上市。因为这个时间段，南疆的大田瓜还没有熟，所以大棚甜瓜很抢手，最好的每公斤可以卖到15元。

今年苏来曼和妻子又租了两个大棚种甜瓜和豇豆，他还在安置小区兼职保安，争取有更多的经济收入。苏来曼风趣地说：“以前在山上放羊，我和妻子经常因家庭琐事争吵不休，现在都

忙着挣钱，没有时间吵架了。”

柯尔克孜人世代生活的帕米尔高原，依然是兄弟二人魂牵梦绕的故乡。大棚的草忙完了，苏来曼还要抽空上趟山，山上的草场和牛羊还是他的财产，“以前有50只羊，搬迁的时候卖了一半，还有25只留在山上的合作社入股了，年年都有分红。”

看着今年的甜瓜长势好，品质也不会差，肯定又能卖个好价钱！哥哥盘算着：今年把技术学好，明年也租两个大棚，就算是政府提供的免费肥料和其他补助不再有，自己也有信心，“政府给的帮助够多了，我自己有力气，靠劳动能赚钱。”他撸起袖子，展示着自己粗壮的路膊。

小女儿图尔迪古丽坚决支持爸爸的想法。已经是新疆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三年级学生的她，见证了家乡短短几年的巨变：“对于世代游牧的柯尔克孜族，易地搬迁扶贫不仅是从上山放羊到下山种瓜的转变，它将帮助中国边境少数民族跨越高原，创造新的历史。”